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七)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國近代經濟史綱要資料

目錄

中國近代經濟史綱要 資料編纂部

中國近代經濟史綱要 資料編纂部

223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七)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125 字数150,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4299·056 定价1.20元

目 录

国外学者论对外经济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李荣昌 钱小明 程麟荪(1)

中国学者论对外经济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陆延 姚欣荣(40)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通商口岸的钱庄.....张国辉(56)

中国近代造纸工业的历史概况与特点

.....徐新吾 沈剑华 陈承庆(67)

报纸——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资料库.....汪敬虞(81)

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历史和现状.....虞和平(90)

(问题讨论)

关于清末商会统计的商榷.....王 笛(109)

初期法币是不兑现纸币.....叶世昌(114)

(史料简介)

《张謇未刊文稿》即将出版.....杨立强(116)

《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一卷简介.....王玉茹(11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在编纂中.....刘 冰(124)

(史料编译)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俄侨工商业.....潘君祥(127)

(外论选译)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周期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1842~1949年)

.....[法]白吉尔著 马敏译 李必樟校(135)

(书评·新书介绍)

读《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两章：“清代的中兴”和“自强运动”

.....宓汝成(153)

《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评介.....徐秀丽(176)

在夹缝中发展——《民营工商企业经营管理之道》述略

.....姚欣荣(182)

(学术动态)

外国经济史的教学研究在中国——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

大会上的报告.....宋则行(185)

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唐文起(193)

首届“中国商会与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纪要.....徐鼎新(197)

东北资本主义发展史学术讨论会纪要.....朱显平(205)

上海市公用局编写行业史工作获初步成果.....张观复(209)

重庆市学术界开展抗战经济的研究.....韩渝辉(211)

(学者介绍)

彭泽益传略.....萧国亮(213)

德怀特·珀金斯传略.....陆 延(221)

国外学者论对外经济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李荣昌 钱小明 程麟荪

五十年代至今，对外经济与中国近代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西方和日本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学者们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并都具有建设性。美国华盛顿大学美籍华裔马逢华教授(Feng—hwa Mah)曾根据这些观点的基本倾向，将其分为两类，即近代化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持前一种看法的人认为对外经济是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持后一种看法的人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压迫，谈不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1]本文将国外关于这个总题目的一些问题的各种观点，介绍如下。

一、有关中国近代化的定义和一般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普遍对这样的问题产生兴趣：近一二百年来，为什么有的国家实现了近代化，有的国家却不能？特别是中国这一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为什么在近代化过程中却失败了？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中国的经历是有典型意义的，因而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什么是近代化？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兹·墨菲(Roads Murphy)提出：“‘近代化’一词不应仅限于指经济的变革，如

国民市场的出现和生产、运输中技术革命的开始等，而且应包括制度、组织和文化意识为适应新的商业、工业和国民秩序所作的各种调整，以及早期亚洲民族主义的出现。”[2]美国中国近代史学者高慕柯(Micheal Gasster)对近代化所下的定义似乎要狭隘一些。他说：“近代化是这样一种过程，即一个社会吸收那些对掌握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所必要的新思想、新习惯和新制度的过程。”他认为，象中国这样的国家，近代化过程总是包含一定程度的西方化，或者说，总是要将截然不同的西方思想、习惯和制度移植到中国社会中去。[3]他还认为，最好将近代化理解为趋向于近代水平但尚未到达的过程，即“许多近代的和传统的力量持续不断调整的过程”[4]。美国罗士曼(G. Rozman)等九位学者在他们合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出，近代化不等于“工业化”或“西方化”。工业化只是指制造业的发展，这种发展只构成近代化的一个内容。所谓“西方化”只是以最早发展起来的那些国家的近代化为模式，但实际上近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化一种模式，西方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实现了近代化。他们认为，“近代化是指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冲击下，社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这些冲击导致有些社会因素直接改变，另一些社会因素的改变虽然是间接的，但或许更有意义，因为它们改变了历史因素起作用的环境。发生改变的社会因素有：国际依赖的加深，非农业生产的相对增长，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发展的趋势，持续的经济增长，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组织和技术的专业化、多样化，官僚政治体制的形成，群众参与政治，各种层次的教育发展等。[5]因此他们将“近代化视为人类历史上演变最剧烈、意义最深远，并且显然是不可抗拒的一种社会变革”[6]。田纳西大学历史系美籍华裔教授郝延平则分析了近代化概念的外延，他认为

近代化包括“机械化、民族主义、社会地位的可变动性、都市化和理性思想”，经济的近代化则指“商业化、工业发展和所有权同管理权的分离”。[7]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提出，理想的近代化应该是指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以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都已清除，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筑在这种生产关系上的全部上层建筑。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化。[8]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波多野善大认为，中国近代化的经济内容和尺度应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因此应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轴心来研究中国近代化的过程。[9]

关于中国近代化与西方关系的问题，国外学者争议很大。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费正清(Fairbank)和美籍华裔学者邓嗣禹最早提出“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西方接触同中国近代化之间的关系。这一模式认为，在西方人来华之前，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儒学思想支配了中国。只是在西方势力冲击下，中国才作出追求近代化的反应。[10]这一模式为许多学者接受。五六十年代广泛流行的教科书《远东史：西方的冲击与东方的反应》将这一模式作为全书的核心概念。[11]后来费正清承认中国社会内部一直在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传统范围内的变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化。[12]近年来，费正清和美籍华裔学者刘广京又指出，中国的工业化是来自国外的，其它方面的变化的重心也在国外。外部的影响对晚清的历史起了空前重大的作用。[13]

墨菲认为，中国社会中近代化因素的发展多少有点不同于西方化，或者说比西方化更复杂。但应肯定，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西方人带来的或者说是他们活动的结果。因此，可将近代化看成是中国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的一系列反应。[14]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伊懋可(Mark Elven)教

授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他认为，自元代以来，中国社会存在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导致发展停滞，不能向近代化转变。这种陷阱由多种因素造成，但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对可耕地的压力日益增加，以致社会缺少剩余产品来推动发展。他强调元代纺织技术的革新不能起到英国工业革命那样的作用，原因即在此。由于这种陷阱的存在，没有外力的冲击是不可能实现近代化的。〔15〕

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的观点有所不同。他指出，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发展已有七个特征：1.高度的商业化，大部分农民为市场而生产；2.出现了由全国性金融网络所支持的双重货币制度；3.出现了一批拥有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以及供应这些城市的复杂的大规模的商业网络和组织；4.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租佃和土地买卖制度；5.人口/耕地的高比例促使农业采用复杂技术，提高单产；6.科举制度使政治上层人物都是有功名的人；7.社会的大部分人重视教育和文化。他还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部分因素在后来的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同其它不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性质同近代化更相容。〔16〕

罗士曼等人认为，从宋至清中期，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生产和交换方式中有许多近代成分：货币的广泛使用；长期稳定和广泛为人接受的法律行为和制度，鼓励了生产和商业的组织者作出理性的选择；能减少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契约的广泛使用；众多的供应者和购买者可自由出入市场以及产品的相似性标志着市场的高度竞争；个人随时关注职业的改变和追求社会地位；土地、劳动力、商品的交易很少有障碍；等等。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人口的膨胀严重阻碍

了商业一体化作用和大规模的分工；由于政府对推进经济变革兴趣不大，除了一般的市场竞争外，中国很少能发展起一种能动的经济力量来刺激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改组；生产的增加为人口增长所抵消；等等。他们认为，在近代化过程中内部和外部的因素总是共同起作用的，但是对一个近代化起步晚的国家来说，它的近代化总是同外国的挑战有关。中国自然也是如此。[17]

美国奥勒岗大学历史系教授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否认西方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认为西方对中国进行的是“帝国主义”入侵。所谓“帝国主义”就是指外国人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整个历史过程。[18]日本学者田中正俊提出，近代世界经济结构是根据西方产业资本的需要而形成的。西方的近代资本虽然为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近代化提供了发展生产力的物质条件；但是当时的世界经济结构不允许中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条件，阻遏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19]因此，他提出，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欧美以及日本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先进”的帝国主义，绝不是样板、先驱和目标。它们强迫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接受其反动统治，这使中国社会中原有的近代化不能实现。[20]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美国的艾瑟·莫里逊(Esther Morrison)博士认为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即西方势力渗入中国后开始的，到清政府崩溃后，近代化的过程才加速。[21]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崛川哲男认为，从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中国旧的经济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发展即近代化就开始缓慢地进行。[22]立命馆大学教授池田诚明确提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一个应积极肯定的历史阶段。[23]东京大学教授富永健一则从另一角度提出问题。他认

为。如果把脱离专制统治的民主化进程视为近代化的标志之一，那么中国的近代化应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24]

法国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教授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她认为，在1911年之前，虽然中国经济中近代化的程度很低，但近代化对社会和政治还是产生了重大影响。[25]她在新作《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周期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文中将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近代化划分为几个时期，即1860~1895年，上层官僚发动的洋务运动；1895~1911年是帝国政府引导官僚和社会上层从事必要的近代化，其中清朝最后十年是政府力图改革的十年；1912~1916年是袁世凯建立近代化专制体制的时期；1916~1927年，发动近代化的任务由政府转到由社会即一部分与外国人交往的社会特殊阶层来承担。1927年以后政府恢复了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力量。据此白吉尔认为，自1860~1916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政府是近代化过程中的主角；一次大战至二十年代初是第二阶段，各种社会力量担任了推进近代化的主角；1927年以后是第三阶段，这时近代化又带上了官方的标记。[26]

罗士曼以几个重要年份为标志划分近代化的阶段。1905年，以儒学经典为内容的科举制度废除了，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找知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结果酿成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早已出现裂缝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几乎割断了；出现了地方财富的重新分配；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等级体系。1930年，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府和一个羽毛初丰的近代工业部门；中国大大改善了向它国借款的地位；虽有日本的压力，但势力范围的争夺大致平息了；近代工业开始迅速增长；都市社会组织发生变化，如商人和工人团体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国人对各个领域的近代知识有更多的了解。[27]

二、外贸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墨菲力主外贸是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他提出，来华的外国人拓宽了中国产品的海外市场，这会引引起中国外销商品生产的增加。尽管相对于传统生产方式的总产量来说外销产品增加的比例还比较低。但这仍是有重要意义的。即使获得的是棉纱之类的进口商品，也是有利于国内生产的，并提高国内生产的竞争能力。考虑到这些商业活动的总的情况，那么无疑外国人使中国得到了利益而不是相反。[28]郝延平在《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一书中提出，外贸带来的不仅是资本和外汇，也带来技术、管理知识、人材和企业家。对任何参与国来说，外贸都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就中国而言，外贸无疑给它的长期发展以积极影响。[29]近年来郝延平又提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沿海地区存在着一场商业革命，其动力之一便是外贸。他还强调外贸所推动的商业活动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跳板。因为外贸是西方向中国技术转移的中介；并且外贸所得的利润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资本，支持了年轻的工业部门。[30]

美籍华裔学者侯继明认为，中国同西方的贸易究竟哪一方获益更多虽不能确定，但是中国肯定从外贸中得到了利益。那种关于贸易会使参与者的任何一方受损害的说法与正统理论是有矛盾的。他还专门研究了中国七十年间（1867～1937）外贸的进出口比价，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等价交换的地位。理由是：一、中国进出口货物比价一直处于变动中，有时恶化有时好转；二、中国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接受者，不是价格制定者，银价下跌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是一样

的，并不会导致比价恶化；三、贸易带来的利益增加与比价恶化不是不相容的，只要比价没有恶化到抵销比较利益时，贸易量的增加就会带来更多收入。〔31〕

密西根大学教授邓伯格(R.F.Dernberger)在其力作《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对外贸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作了详细分析。他认为，第一，农矿产品同国外工业品交换自然会增加中国经济的商品净量；第二，由于外资和侨汇长期流入，使中国的贸易长期入超而国际收支并未发生严重问题；第三，没有证据表明进出口比价的恶化。但是在问题的另一面，外资和侨汇的长期流入本可以用于十分重要的资本积累，但中国却将它用于消费。从出口来看，积极和消极作用同时存在。出口刺激了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也有利于农民维持过得去的生活水平，但是农矿产品出口对其它部门发展的影响甚小，这些出口货只是成为外国工业的原料，而没有成为中国加工业的原料。进口方面除鸦片是绝对有害的以外，其它货物也有两重影响。棉制品、糖、粮食等大宗产品的进口一方面补充了国内消费品供应的不足，另一方面，这些都是最终产品，对中国的生产并不能产生前向联系效果(forward linkage effects 通俗地说，所谓“前向联系效果”是指一个行业的产出成为其它行业的投入时，推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本文作者注)。因此这些进口有利于消费者，但不能减低其它生产部门的成本。生产资料的进口对中国生产部门能带来前后向联系效果(同样，后向联系效果是指一个行业为了进行生产，需要其它行业提供各种生产要素，从而推动了其它行业的生产。——本文作者注)，并且也带来技术转移，但是它在进口中所占比重偏低。邓伯格的结论性意见是：外贸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有积极作用，但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外国人影响所及的地理范围狭隘，妨碍

了外国人经营的部门同中国经济之间的那种大有好处的前后向联系结构。[32]

美国学者艾山克(Isaacs)则认为,西方商人靠鸦片的帮助,建立起长期贸易顺差的地位。白银外流和工业品的涌入,严重恶化了农村中早已存在的危机状况。鸦片的广泛吸食使白银从农村流向城市,引起国内市场的萎缩。白银外流使铜币价格下跌了20~30%,导致生活费用剧增。外国的棉制品和其它工业品进口,将中国的手工业逼上了绝路。[33]周锡瑞认为鸦片贸易在西方对华贸易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鸦片是唯一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货物,它不仅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而且足以使西方人弥补贸易逆差。事实上在十九世纪西方商人的鸦片推销一直是他们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周锡瑞还指出,帝国主义将中国拉入世界市场严重地扭曲了中国经济。十九世纪世界市场对中国茶、丝的大量需求,使许多农民将自己仅有的资源用于茶丝生产。但是以后中国茶丝出口的减少,使无数中国农民难以度日。尽管有人认为日本和锡兰夺走中国的丝茶市场当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无能,但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是:1.外国人开辟、控制了中国货物的市场,最后又关闭了这一市场,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是世界市场的受害者,它只是消极地参与了这一市场;2.如中国政府想有力地参加竞争,要么同意外国人在中国种植茶叶,要么象日本一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管理这些行业。而中国要想建立这样的政府只有将帝国主义赶走才有可能。茶丝出口下降后,虽然有其它货物的出口增加来补充,但是出口货物中原材料比重上升,而加工产品的比重却下降了。并且中国进出口货物的贸易比价大大恶化了。以1913年进口价格对出口价格的比率为100,到1935年已上升至122.9,而1870年时仅为76.5。这就意味着1935年的进口货物的价格水

平相当于1870年的160%。[34]

美国女学者莫尔德(Frances Moulder)根据左翼经济学家瓦勒斯坦的“世界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一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把其它国家都吸引到一个经济体系中来，形成以西方国家为宗主国、其它国家为卫星国的世界经济结构。中国被卷入世界经济结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是通过外贸。外贸一方面使中国成为英国大宗消费品如茶叶的重要来源，成为英国殖民地产品如鸦片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为英国工业品、特别是为棉纺织业提供市场。这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英国的附庸地位而不能自拔。[35]莫尔德的观点与大部分西方学者不同，虽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但较少为人接受。

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产业或行业着眼，讨论外贸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匹兹堡大学教授饶斯基(Thomas Rawski)在考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后提出：“从(抗日)战争前中国工业史的全过程来看，外贸对于工业进步是起了积极影响的。民营的机器制造和化学工业的起源证明了赫希曼的观点：‘进口……最可靠和无可争辩地证实——这里有市场’。当进口改变了地方市场的规模和赢利后，就会促使中国商人为国内生产工业品。”[36]他以第一次大战时期的中国工业为例指出，战争减少了外国纺织机器、烧碱和其它重工业品的供应，而中国的企业由于技术水平太低不能对此作出反应，没有能力生产这些短缺而昂贵的重工业品。这个插曲表明，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遏止外国商品进口以保护尚未相应发展起来的国内工业，那么只会提高国内的生产成本和减少投资，而不会刺激受保护产品的生产。[37]饶斯基还认为外贸推动了中国机械和化工行业的发展。他说，外国机械设备的进口带来了技术转移。因为机械设

备的进口必然要补充原材料和零配件，也需要维修。当中国人熟悉了这些设备以后，有些较简单的加工就会自己来承担，一些从事维修服务的企业也会应运而生。当经验和资本增长以后，本国的机械工业就会逐步取代外国的。这种进口替代的过程从维修服务的替代延伸至商品生产的替代，同时中国企业也获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到三十年代中国已能生产各种工业机械和化工产品了。[38]

鲍尔州立大学教授郑竹园(Cheng Chu-Yuan)强调石油制品的进口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他指出：1.石油制品提供了效率更高的液体燃料，促使传统手工业向机械化转变。第一次大战后中国进口的机械设备剧增，这些机械设备都需要耗用汽油、煤油、重油。这些大机器的安装意味着对进口的燃料油和润滑油的依赖加深。2.燃料油的进口满足了汽车的需要，刺激了中国公路系统的发展。二十年代汽车进口的增加导致1927年中国筑路运动。并且汽车的使用肯定对中国的工业化产生了必要的路效果，[39]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教授米拉·威尔金斯(Mira Wilkins)也肯定美国输入中国的缝纫机、煤油和汽车等对中国近代化都产生了影响。[40]

哈佛大学博士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根据他对中国棉纺织业的研究指出。棉制品进口占领了中国市场，影响了中国棉纺织业的近代化过程。[41]而顾寿恩(Koo Sou-eng音)则认为外国棉制品的进口对中国棉纺织业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导致手工纺纱、织布的衰落，另一方面却刺激了近代棉纺织业的产生。[42]小山正明认为外国棉制品的大量进口，造成农村家庭手工业破产，结果导致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经济基础。因此外贸的展开是中国棉纺织业实现近代化的条件。[43]

罗伯特·加德拉(Robert Gardella)曾提到福州茶叶出口有利于近代企业,因为茶叶出口税款构成了福州船政局的主要经费来源。[44]

关于外贸对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影响,外国学者观点分歧很大。侯继明认为国外棉制品的进口开始对手纺业确有威胁,但影响程度如何却尚无资料可确定。而棉纱的进口在二十世纪初却刺激了手织业的发展,如高阳、定县的手织业就是靠进口棉纱发展起来的。总地说来,外国棉制品进口并未打击中国的手工业。相反,由于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45]密西根大学教授费维恺(A·Feuerwerker)认为,所谓“外国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中期起在逐渐“摧毁”和“剥削”国内的手工业的指责过于简单,这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不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即使在据说是受“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害最深的纺织业方面,61%的国产棉布(以平方码计算,如以码为计算单位,应为73%)仍是手工织成的。某些重要手工业,特别是纺纱业,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期间产量急剧下降。可是不论从理论或实际情况看,都有理由认为,手工业的国内需要和出口需要的总产量在二十世纪并没有下降。更有理由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但反驳这些最粗浅的公式化指责,并不是否认手工业部门在这四十年中发生过重大的结构变化,也不是否认由于这些发展而出现的紧张和失调对大部分人口起了不利影响。[46]小山正明也认为,印度棉纱的进口,使中国出现了新土布生产,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工场手工业,有力地抵制了洋货。[47]

克劳斯则认为1870~1900年间棉制品的进口使中国的手工纺纱和棉花生产大受打击,引起了资源的重新分配,影响中国